

家庭暴力防治網絡中之加害人處遇工作~ 以 Yalom 的團體治療因子來分析男性婚姻 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成效

廖靜薇、陳佩潔

壹、前言

臺灣在民國 87 年頒布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後的 2—3 年開始訓練第一批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專業人員，而在 90 年 7 月開始啟動臺灣第一梯次的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處遇工作，筆者（以下均指第一作者）是臺灣投入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工作的第一批心理衛生專業人員，至今滿 11 個年頭；這 11 個年頭，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以下簡稱家防會）從立法、推動相對人裁定前評估、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訂立處遇準則，到現在臺灣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工作在各縣市已普遍進行，這幾年更開始追蹤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的成效，這也是整個家庭暴力網絡中所關注的。

目前家暴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基本進行週次為 12 週，以 12 週的團體要促使加害人產生改變，了解相關法令的嚴重性、降低暴力行為、增加情緒控管能力、回復本身穩定

生活、增強日後面對處理親密關係或婚姻中的相關議題，這需要考量相當多的元素，如團體帶領者的專業知能、團體進行的形式、加害人本身的可教育性、加害人本身的人格特質及接受資訊的能力、加害人本身的社會支持程度、家暴事件暴力程度等等，目前家庭暴力加害人接受處遇的成效評估，筆者了解這是一件困難但卻是需要去面對的議題。在本季刊第 136 期，陳怡青也針對方案評估方法在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評估研究的運用撰寫一篇文章，文章中採用執行性目標、中介性的目標、成果性目標為架構來進行探討，筆者此篇文章則以中介性的目標來探討在團體過程中產生的正向改變，以 Yalom 的團體治療因子來分析男性婚姻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成效。

貳、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處遇工作介紹

一、加害人特質

根據周月清（1996）整理西方文獻對施虐男人特質探討，根據華盛頓特區的婦女虐待防治方案的資料指出：

- (一)施虐男人來自社會各個種族、社會階層、宗教、收入、教育程度。
- (二)施虐者的特質：他們往往否認暴力行為的嚴重性，面對詰問時，他們傾向抱怨他們的伴侶，而拒絕負起事後責任。
- (三)施虐者可能在其成長背景中學習以暴力行為來解決問題；施虐者可能來自一個有暴力行為發生的家庭。
- (四)很多施虐者未必在其工作上或朋友關係中會有暴力行為。
- (五)很多施虐者對兩性關係及父母角色有著傳統而固著的想法。
- (六)施虐者比較重視他們自己的需求，而不在乎被他們所虐待的伴侶是否會有被虐待引起的痛苦和傷害。
- (七)大部分有虐待傾向的男人未必是精神失常者，不該視這些男人全是有病之個體，而因此忽略了他們負起虐待行為的責任。
- (八)酗酒或藥物濫用並不是直接造成虐待行為的原因，大多數是因其原本即存在的暴力傾向。
- (九)社會教導男人控制他們的女人，使用暴力或威脅的方法來控制他們的伴侶。社會允許男人以暴力來解決問題。
- (十)施虐者的暴力行為要予以控制，否則它不會自然消失。

以上提及的加害人特質，雖然是美國華盛頓特區在 1990 年發表的資訊，但是描述的這些加害人特質和筆者現在接觸的臺灣加害

人特質還是很貼近，家庭暴力及家庭互動的議題不因東西方文化及時間而有太大的差異。

另外，筆者以加害人接受處遇的地點不同，概略將被裁定處遇的加害人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不遵守法令，在家暴事件後仍違反保護令及觸犯其他法令，對受害人施以不同形式騷擾或不同程度的傷害，這一類加害人通常不會到社區處遇機構（團體）報到，更不會依保護令裁定接受處遇計畫，最後有可能是在獄中接受相關課程；另一類是違反保護令或其他法令，但被裁定緩刑，而在地檢署報到及接受處遇；第三類是接到保護令之後，依規定到社區處遇機構（團體）接受處遇計畫，相較之下第三類的加害人對於法令是仍有畏懼，也較有可能接受保護令中的相關規定，也就是可教育、可輔導性高的一群家暴加害人。當然，第三類的族群中還可以分出很多的類型，譬如：以接受處遇的出席狀況，就可以分為順利完成裁定次數處遇、中斷處遇、斷續完成處遇，不同類型也代表其特質又有些不同，筆者將有到處遇機構（團體）報到、最後能順利完成處遇的這一類型加害人，視為最有可能因法令介入或處遇而產生改變的族群，也就是最具有輔導及改變成效的加害人。

有關解釋家庭暴力成因之相關理論甚多，依鄭瑞隆在 2002 年撰寫的家庭暴力加害人特質及處遇評估工具研究中整理有生態系統理論（Eco-system Theory）、衝突理論（Conflict Perspective）、資源理論（Resource Theory）、交換社會控制理論（Exchange/Social Control Theory）、社會生物學理論

(Sociobiology Theory)、女性主義理論(父權觀點與社會文化觀點)(Feminism: Patriarchal/Cultural Perspective)、個人病理觀點(Individual Pathology Perspective)、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社會情境/壓力與因應理論(Social Situation/Stress and Coping Theory)。

依據加害人特質、相關理論及實務經驗,家防會委託專家學者發展出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處遇準則中規範之核心課程內容:指認暴力行為、暴力的本質—權控與選擇、暴力的影響、情緒壓力、學習非暴力解決衝突的方法、尊重的兩性關係與家庭關係及家庭暴力防治相關法律課程等七大主題。

針對加害人實施輔導或治療,是降低暴力再發生的最直接的治本方式。當然,不可諱言有些家庭暴力是互動及情境產生的,加害人有可能是非典型或是習慣性暴力者,若是加害人與受害人仍然同住一起,這樣的案例也許是要提供夫妻互動模式的調整優於單方面提供加害人處遇。在家暴防治網絡中提供加害人處遇的工作者的核心價值與目標和防治網絡的所有工作夥伴都是相同的,就是終止暴力行為,確保被害人安全。但是,在專業關係中要促使服務對象發生改變,服務對象必須可以感受到協助者的接納與尊重當事人身為人的權益及價值,這樣關係才能建立及產生改變;所以,加害人處遇的專業人員在和加害人的互動上是要去接納及同理加害人面對家庭或親密關係的衝突或破裂、司法過程被孤立的感受、身為施暴者的標籤等等複雜混亂的情緒,但絕不是贊同加害人採

用暴力行為來處理負面情緒或問題,而且也不能為了建立關係而成為加害人的同盟者;倘若如此,這也不會是真正的專業關係,這些議題都是身為加害人處遇人員在工作過程時時要自我覺察與相互提醒的。

二、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處遇規範

中華民國 87 年 6 月 24 日總統(87)華總(一)義字第 8700122820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54 條;本法自公布日施行,第二章至第四章、第五章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六章自公布後一年施行。也就是說加害人處遇工作依法是在民國 88 年開始啟動,90 年 7 月在當時的高雄市及高雄縣各開始進行臺灣第一個家暴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高雄市的團體是由黃志中醫師和林明傑教授帶領,高雄縣(目前已改為高雄市)的團體則是由筆者帶著慈惠醫院社工室同仁開始進行,在加害人處遇工作正式啟動之前,筆者除了參與每一場家防會主辦之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專業人員訓練課程之外,家庭暴力者輔導手冊一書也成了筆者和同仁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工具書。這 11 年來,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之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工作的發展,團體實施的空間有心理衛生中心、社福中心、警察局、精神醫療院所等等,依據家防會所訂定的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處遇準則,執行認知教育輔導的專業人員有醫師、心理師、護理人員、社工人員、觀護人、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官、學校輔導老師、其他受過家庭暴力防治相關專業訓練且參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實務至少 3 年以上。

在專業知識背景上的要求是:

- (一)首次參與帶領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工作者：帶領團體前應接受認知教育輔導準則所定之核心課程及非志願性個案的處理技巧等訓練課程至少 21 小時，參加一個完整團體方案（12 週或 24 週）之見習課程，第 1 年並應受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帶領者之訓練課程標準所訂相關主題或其他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有關之在職訓練至少 14 小時，並接受督導至少 6 次或 12 小時。
- (二)參與帶領家暴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工作 3 年內未達 72 小時者：每 3 年應受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帶領者之訓練課程標準所訂核心課程至少 18 小時，相關主題或其他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有關之在職訓練至少 24 小時。
- (三)參與帶領家暴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工作 3 年內超過 72 小時以上者：每 3 年應受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帶領者之訓練課程標準所訂核心課程至少 9 小時，相關主題或其他與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有關之在職訓練至少 21 小時。

目前執行認知教育輔導的專業人員資格與專業知能的要求已趨於完整，在認知教育輔導類型方面以加害人之危險性及暴力行為與飲酒之因果關聯等，分為以下三種：

- (一)認知教育輔導 12 週：低危險且無合併飲酒問題。
- (二)戒酒教育 12 週：低危險且合併飲酒問題。
- (三)認知教育輔導 24 週：中高危險及中高危險且合併飲酒問題。

目前在認知教育輔導團體的模式有：(1)八里療養院及北投醫院一起發展出的整合性

別平等與人本學派之輔導教育模式（陳怡青、黃信得、陳俊堅、劉素芸、朱憶華、廖文謹、張幼玫、洪秀汝、文宗華、楊美惠、張莉英、朱淑華），(2)林明傑與黃志中的家庭暴力加害人輔導治療方案—以再犯預防及現實療法為取向之認知行為療法~團體及個別之輔導架構，(3)嘉南療養院認知教育暨情緒支持團體（李娟娟、張芳榮、王梅麗、謝宏林、吳嘉純、督導 張達人），(4)筆者和目前工作地點的屏安醫院同仁使用的以半結構團體互動模式的家暴加害人認知輔導教育。

對於加害人接受處遇的重要性，在筆者的 11 年高屏地區本土工作經驗中，高屏地區的男性家暴加害人的學歷以國中、高職居多，工作性質為從事勞力及臨時工居多，年齡以 30—50 歲居多，且常有經濟問題。這些家暴加害人大多受學習模仿及社會文化影響，有著傳統男性權威的觀念、對於家庭暴力資訊瞭解能力不佳、情緒管理差、不擅表達內心想法及感受、對於家暴事件的真正原因無法深入探究、習慣將家暴行為歸因於表面原因或是受害人或法令所導致，習慣將自己的暴力行為以淡化及合理化方式解釋，採外在且表面的歸因方式，如配偶誣告，或是法令不公、法令是站在保護女性的立場、自己才是受害人。筆者認為接受處遇計畫可以增加這些加害人在家暴防治相關法令的了解、對自己家暴事件及夫妻互動的探究、在團體中獲得情緒宣洩、支持與接納、澄清原本對於自己暴力行為之認知，藉著每週固定參與課程也可以協助加害人漸漸回復到情緒平穩的生活狀態。這些在團體中所經歷的經驗，其實在他們的以往的生活經驗中是陌生

的，沒有機會接觸及參與的；筆者相信經過這樣團體的歷程，對這些加害人面對和受害人關係破裂.....等等變動，在重新理解上是有所幫忙及效用。

另外，若是加害人違反保護令，或是犯其他案件而未到指定機構（團體）參與處遇計畫，在地檢署及監獄中也都啟動了加害人處遇課程，筆者認為在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處遇方面的專業知能要求、執行階段及地點，在這 11 年來已發展出臺灣本土的模式，唯家暴加害人被裁定處遇計畫所占比例仍低。依據內政部、司法院統計資料，民國 100 年各地方政府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通報件數已達 10 萬 4315 件，被害人聲請保護令件數為 1 萬 4296 件，而裁定加害人完成處遇計畫僅為 3,462 件，數據顯示，通常保護令核發率約 6.2 成，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裁定率不及 2 成（邱惟真、吳方政、陳育璫，2012）。

筆者認為相對人裁定前評估制度有其歷史地位及推動加害人處遇的重要性，但最理想的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裁定方式是少事庭法官透過職前或在職教育訓練過程可以了解及認同加害人處遇計畫的目的、功能，且熟悉當地加害人處遇的相關資源，進而能逕裁加害人參與處遇計畫，才能提升加害人接受處遇的比例及普遍性。

參、以 Yalom 的團體治療因子來分析男性婚暴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成效

一、動力式團體及 Yalom 治療因子介紹

筆者在近幾年轉換採半結構動力式團體

帶領方式，轉換帶領方式的原因是奠基於多年的家暴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經驗，發現加害人認知輔導教育團體為一非自願性團體，在報到及團體期間初期，大多數加害人對於被裁定要接受處遇、和受害人之間關係改變、參與司法流程的經驗等等，通常是抱持著憤怒及不滿的情緒來到團體，因此加害人在團體中會採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其抗拒，有的加害人會沉默不語、不參與討論，有些成員會極力阻擾團體的進行，而故意跳離討論主題為其表達抗拒的形式。當團體帶領者面對成員的不滿情緒時，若仍要照團體預定的核心議題依序進行時，是困難的，且和整個團體動力是抗衡的，此猶如逆風行船，故後來筆者和協同帶領者摸索及發展以動力式團體模式來進行加害人認知輔導教育團體，運用團體動力來使力去促使成員產生改變。

此團體模式為半結構及動力式，團體一開始即進行成員 check in，收集成員一週來的工作與生活近況（尤其是成員和受害人之間的互動情形及確認成員的再施暴危險程度），第二階段是找到幾個大多數成員有興趣的共同議題進行討論，討論過程帶領者會連結有共同經驗之成員、將成員提出的議題轉化為正向具學習性的議題、以成員彼此之間的互動及回饋為主、少教育性或指導性內容、反映成員的矛盾狀況，最後則是進行當次團體討論議題之總結。其實成員在每次團體一開始抱怨的言語中就會呈現成員目前所在意的議題，這些議題雖然不是依照筆者原本排定的認知輔導教育的核心主題次序出現，但其實由成員提出所關心的這些議題，仍然是包含在原本設定的這些核心主題中。

蘇利文在西元 1940 年的書上提到一個人心理健康的程度是與他對自己的人際關係之覺察成正比，美國著名存在心理療法及團體治療大師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發展的一種基於人本—存在主義取向的心理動力團體模式，此模式是提供一個信任的、溫暖的、支撐的團體環境，使成員能夠其他成員中學習及自我覺察，同時也成為他人的社會支持力量。亞隆也歸結了 11 個團體治療因子，這 11 個團體療效因子如下（鄧惠泉、湯華盛譯，2001）：

- (一)希望的灌注（Instillation of Hope）：在看到別人進步時，便會對自己的進步抱有很大的希望。
- (二)普同性（Universality）：成員在生活中充斥著嚴重的孤獨感，他們暗自相信自己是唯一孤獨、悲慘的人，只有他們才會有些無法為人接受的問題或衝動，少和他人做坦白直率的溝通。
- (三)資訊的傳授（Imparting of information）：在團體中不管是由團體帶領者或是成員針對生活上的問題提出忠告或直接的指導，都是一種資訊的傳授。
- (四)利他性（Altruism）：在任何一個團體中，每一位成員對其他人都有莫大的幫助，因為他們有共通的問題，他們相互提供支持、保證、建議。
- (五)社會化技巧的發展（Development of socializing techniques）：社會學習及基本社交技巧的建立。在互動取向的團體中，成員可以透過彼此坦誠的回饋，而發掘到自己調適不當的社交行為。
- (六)模仿行為（Imitative behavior）：在團體

中，成員們可以藉由觀察具有類似問題的成員之改變而獲益，這個現象稱代理學習。

- (七)情緒的宣洩（Catharsis）：情緒的宣洩是一個複雜的治療因子，它與團體中一些其它的過程都有關連，特別是普同性與凝聚力。在團體過程中，真正重要的是團體中的其他成員，要能對個案的內在世界給予情感上的共鳴，並進而接納他的情緒。
- (八)原生家庭的矯正性扼要重現（The corrective recapitulation of the primary family group）：成員在原生家庭中往往有一些不好的經驗，團體提供許多扼要重現的機會。
- (九)存在性因子（Existential factors）：在團體中不管從他人身上獲得指導與支持，最終的責任還是落在自己身上，一個人不管與別人多麼親近，他終究無法迴避人類存在上最根源的孤獨，而當他們接受了這些議題的一些現實面後，他們會學著更坦然、更勇敢去面對自己的極限。
- (十)團體的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團體的凝聚力是指成員們對團體以及其他成員所具有的吸引力。在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團體中，每個人互相接納、支持，而且願意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 (十一)人際學習（Interpersonal learning）：從社會縮影中的行為來學習。

二、以 Yalom 的團體治療因子來分析男性婚暴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成效

目前裁定的加害人處遇項目中，認知教

育輔導及戒酒教育大部分都採團體方式進行，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則採個別方式進行居多。主要原因是裁定認知教育輔導及戒酒教育人數較多，採用團體方式除有經濟效益的考量外；另一部分是透過團體互動的方式，由同儕成員給予建議及支持之效果遠比一對一的輔導效果來得佳。

這群加害人來到社區處遇機構（團體）報到時，有些成員已和受害人離婚、分居，或是仍然同住，幾乎在每個團體中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會有處於各種不同的關係狀態中，每次的團體因成員組成不同都有其不同的特質，在筆者的工作經驗中沒有一個團體的動力和特質是相同的，每一次的團體對筆者而言都是一次新的挑戰。

每次團體依成員目前有興趣的主題進行討論，促進成員彼此之間的連結，尤其是針對一些在團體中沉默不語的成員關係的連結尤為重要，團體的人際互動呈現家庭互動的投射，這類成員在家庭生活中通常也是壓抑及沉默，要向他人表達心理的想法及感受是有困難或不習慣的，所以，能讓這些沉默的成員在團體中感受到和成員之間有普遍性相同的議題，得到支持，願意表達就有情緒宣洩的作用、也可以在團體中學習模仿其他成員和受害人修復情感的方法，另外也可以讓一些因為觸犯家暴法，但犯行危險性低的成員，有協助他人利他的形象。

筆者每次帶領團體前及團體後都和協同帶領者進行討論與分析，並做成記錄，確認每次團體中出現的團體療效因子及情境，整理如下：

(一)希望的灌注 (Instillation of Hope)：當成

員在團體中分享自己夫妻關係修復的歷程，例如自己改變原本負面的情緒表達及行為方式後，配偶也能感受到自己的誠意與察覺自己行為的改變，因而願意再接納自己，這樣的改變不僅改善了夫妻關係，連帶整體家庭氣氛也有所改善。如此，對於仍想跟配偶維持關係及注重家庭關係的其他成員，亦能獲得信心且有動力改善自己的行為。

(二)普同性 (Universality)：成員在團體中可以發現其他成員們對於法令及相關議題有共同的情緒，會比較願意表達且認為這樣的表達是可以被了解。例如：成員在團體中也會遇到在家暴事件發生後與配偶分居或離婚的其他成員，如此可以減少他們認為自己是唯一不幸的人想法與感受。這樣的團體經驗可以協助成員不再認為婚姻的問題與感受，是他個人所獨有的經歷與感覺，如此可以協助成員得到相當程度的情緒緩解以及與其他成員有同舟共濟的感受。

(三)資訊的傳授 (Imparting of information)：成員在團體中不管是由團體帶領者或是其他成員針對保護令的規定及爭取監護權…等方面的問題提出忠告或直接的指導，都有利於成員們對於此部分訊息的學習，這都是一種訊息的傳授。

(四)利他性 (Altruism)：當成員在團體中分享自己正向的夫妻感情修復經驗的過程，還是給予其他成員生活或工作上的建議或支持，這樣的歷程都鼓舞成員更看重自己，並助於提升成員的自我形象。

(五)社會化技巧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socializing techniques)：在團體中成員可以學習尊重其他成員的發言權、學習遵守團體規範、透過其他成員的回饋調整自己的言語表達及和他人互動的模式…等等，這些經驗在成員們日後的社會互動關係中都是非常具有價值的。

(六)模仿行為 (Imitative behavior)：成員可以在團體中觀察並仿效具有類似問題的其他成員之正向改變，而能自我反省並改善自己的負向行為模式。

(七)情緒的宣洩 (Catharsis)：此項是團體中最明顯的療效因子，成員透過在團體中表達對於夫妻互動關係、家暴事件及司法過程…等的不滿情緒，且能獲得其他成員的共鳴。有些成員在社區中是沒有讓同事或朋友知道自己觸犯家暴法且要接受處遇一事、有些成員則是人際關係封閉，沒有可以深入互動交流的對象，團體中的情緒宣洩尤其對於一些覺得自己是被害的加害人來講是重要的，但在此類情緒宣洩過程會藉由團體動力來反映讓成員思考“自己真的是受害嗎？”。

家暴加害人處遇團體中，多數成員本身有表達內心情緒的困難，有些成員習慣以憤怒的方式來表達其對現實生活或婚姻狀況的不滿，但內心真正的情緒卻是憂鬱，當成員在情緒宣洩時，呈現出來的情緒反應和他所洩漏的一些線索不合時，也是團體帶領者反映讓成員自己再思考其外顯行為與內在情緒不一致性的機會。

雖然透過成員間分享相同的經驗可以獲得情緒宣洩的效果，亦可促進成員之間的凝聚力；但這樣的凝聚力，在團體初期成

員常是用來和團體帶領者抗衡的，團體帶領者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這股團體動力，而如何讓這股團體動力導向對成員及團體有助益的方向，則是團體帶領者的重要學習課題。

(八)原生家庭的矯正性扼要重現 (The corrective recapitulation of the primary family group)：團體中，會與成員討論早期家庭經驗及父母親的互動關係，這個過程，讓成員有機會表達原本家庭中的衝突或父母親夫妻間的相處問題。此時，帶領者即有機會澄清或面質成員，其實成員在團體中的許多表現或有些團體的情境是很類似其早期的家庭經驗，成員這樣的表現或團體中呈現的情境，也會在成員自己的衍生家庭中或夫妻關係中「重現」，因此這樣的「重現」經驗，也是具有矯正意義。

在團體中曾有沉默的成員，在早期的家庭經驗中，曾經歷父母親的夫妻關係不佳、母親被父親家暴或是自己就是被虐者，造成他習慣壓抑自己的情緒，這樣的習慣或經驗成員可能會帶到自己的衍生家庭或親密關係中，因此平常仍習慣壓抑自己的情緒，累積很久後才爆發並發生家暴事件。成員如此壓抑的個性，在團體中，會以沉默來呈現，習慣採壓抑自己的情緒且不表達自己的想法。

(九)存在性因子 (Existential factors)：成員藉由團體過程中，可以從帶領者或其他成員的身上獲得指導與支持，學習壓力調適與情緒管理的技巧，或是學習解決夫妻負向互動關係的技巧。但是不管成員們在團

體中獲得多少的支持、情緒管控或是解決問題的技巧，每個成員最終還是需面對自己婚姻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最終只能靠成員自己解決。我們期待當成員能接納婚姻議題的現實面後，成員就可以進一步學會坦然且勇敢的面對自己的婚姻問題及自己解決婚姻問題。

(十)團體的凝聚力 (Group cohesiveness)：幾乎所有的團體都可以提供所有成員歸屬感的感受，例如有些務農的成員會帶自己生產的農產品來分享給其他成員及團體帶領者。

另外，帶領者在每次團體中，都以成員們有興趣且具共通性的主題進行討論，如此可以促進成員彼此之間的連結，透過成員彼此所給予支持與鼓勵，也可以讓平常沉默的成員願意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與感受，協助成員在團體中宣洩情緒，這樣的分享與被接納的經驗，亦可以協助成員進而願意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

團體中，成員可以放心的隨時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感受，知道自己隨時都有機會成為團體討論的中心，這樣的團體互動關係，可以提高成員的出席率、對討論議題有興趣、願意參與討論、彼此互動活躍、而非和團體帶領者之間的單向互動關係，這些都是可以評估團體凝聚力的面向。

(十一)人際學習 (Interpersonal learning：一個團體就如像是一個社會的縮影。成員帶著各式各樣夫妻互動關係及固著的想法來到團體，成員在團體中的表現就近似於他平常在人際互動關係中的表現。成員在成員們彼此相互回饋及團體

規範中學習，並修正自己行為模式、學習尊重他人，這就是一種人際學習。

肆、結論與建議

在筆者的團體帶領的過程中，發現運用動力式團體需以封閉式團體形式進行，才能讓團體發展階段產生一段長期穩定的團體工作期，也才能促使團體產生較多的療效因子，另外在團體前及團體後，團體帶領者要進行進行相關的觀察討論及分析，團體帶領者及協同帶領者之間要有良好的合作默契及團體敏感度。再者兩位帶領者都為女性，筆者的團體督導者曾提醒筆者注意性別議題，女性團體帶領者所帶領的男性婚暴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在性別與動力的議題確實有其值得探討之處，例如成員將對太太的憤怒情緒轉移到團體帶領者身上、男性權威角色重現、團體帶領者本身的特質及價值觀等等，但在此篇文章中暫不討論此部分，留待日後整理。

本篇是實務工作經驗的整理，筆者透過工作經驗呈現男性婚姻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團體確實能提供在社區中具可教育及可輔導的加害人在相關法令的認知增強、學習情緒表達、降低衝動行為、重新思考家暴行為的責任問題等等。除希望將此工作經驗提供帶領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工作者參考，也期待能讓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相關成員更了解處遇工作的內涵及非量化的團體成效；另外目前接受處遇計畫的加害人在家暴加害人總數中占的比例仍低，如何讓更多加害人能進入處遇計畫是終止暴力、保護受害人的重要

家庭暴力防治策略之一。

關鍵詞：家暴加害人處遇、認知輔導教育、

（本文作者廖靜薇現為屏安醫院社工室

團體治療因子

主任；陳佩潔現為屏安醫院社工師）

參考文獻

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12.9）

<http://dspc.moi.gov.tw/ct.asp?xItem=1336&ctNode=464>

李雅琪（2007）。家庭暴力加害人參與認知輔導團體後行為改變之探索性研究，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3(1)，頁 57-94

周月清著（1996）。婚姻暴力理論分析與社會工作處置。臺北：巨流。

林明傑等譯，Michael Lindsey 等著（2000）。家庭暴力者輔導手冊。臺北：張老師文化。

邱惟真、吳方政、陳育璫（2012）。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成效：以「彰化簡易型團體」為例，「優勢觀點於家庭暴力相對人服務及網絡合作」研討會論文集，頁 3-19。

陳怡青等（2006）。整合性別平等與人本學派之輔導教育模式。

鄧惠泉、湯華盛譯，Irvin D. Yalom，M.D.著（2001）。團體心理治療。臺北：五南。

鄭瑞隆、王文中（2002）。家庭暴力加害人特質與處遇評估工具之研究。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